

近代中国与世界 的冲激和共存之问题

· 徐中约 ·

〔编者按〕徐中约为美国加州大学历史教授，今年6月11日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举行的座谈会上，作了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报告，下面是报告的摘要。

人有人格，国有国格（Identity）。一部中国近代史可说是中国追求一个新国格的历史。

近代中国的巨变及其人民遭遇的苦难，是历史上罕见的。近代中国的变化既深且远，比较起来过去的变化都逊色不及。这个国家现在能够试爆原子弹，放射人造卫星，与美国经过二十年的不和之后，恢复了邦交；在联合国中担当重要的角色，成为世界主要国家之一。这些变化使人有难以置信的感觉。同一国家在一个半世纪之前，既不能制造船炮，也不懂什么是议会制度。在军事上的转变更为惊人：在1842年，英国只用二十五艘军舰和一万多士兵，就轻易地击败了清帝国，但在五十年代的朝鲜战争，五十多万美国及联合国军队，与朝鲜军队和中国的志愿军僵持不下，而在六十年代的越南战争，同等数目的美国士兵也不能抵挡中国支持下的越南军队。在短短的一个世纪中，中国从一个软弱的封建帝国变成充满魄力及前进思想的社会主义强国，实在是人类历史上惊心动魄的一件大事。在这个剧变的洪流中，中国体验到从未有过的冲激和共存问题，因为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实在太不同了。

十九世纪以前二千多年的旧中国，在东亚是独一无二的大帝国。在这二千年中，它的社会政治体制很安定自足。其国体是由皇帝统治的一个一个朝代，其经济以农为本，其社会为士族乡绅所控制，而其学术风气则为儒家笼罩。在对外方面，中国自认为居世界中央的唯一大国。很多历史学家认为，直到十八世纪中叶，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之一。欧洲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如史宾洛沙、莱布尼兹、哥德、伏而泰和阿当史密夫都十分敬佩与宗教分离的中国政治和社会体系。

不过，到了十九世纪，中国的光荣日子便不能持续了。西方工业革命所产生的动力及科技，使列强以雷霆万钧之势，打开中国贸易及外交的门户。

在拿破仑战争之后，英国首先在两次鸦片战争中，使得清政府丧权辱国。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焚烧圆明园，更加证明西方的蛮横和强霸。中国面临一个全新的国际形势，头脑较清醒的领袖们承认西风东渐之不可挡，但最迫切的问题是：怎样在这个新的形势下生存及图强？当然，儒家的天朝观念并不能解释和解决这个问题——中国需要转变成一个近代的国家。在这个蜕变过程中，中国遭遇到从未有的冲激及生存的双重危机。

西方文明在很多方面是充满生气活力的，但对十九世纪的中国而言，则破坏性多于建设性。它打垮了旧的传统，却未能建立一个新的秩序，致使中国在废墟中收拾残局。中国一方面受制于传统思想，另一方面对西方一无所知，所以只好在黑暗中试图摸索前进。中国的困惑是不知要放弃旧传统到什么程度，也不知要接受新文明到什么程度，才能够使中国光荣地站在国际大家庭之中。

寻求新的体制，即寻求新的国格，这点与传统中国的自大及一向鄙视四夷的观念背道而驰。不过，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战败以后，较开明的中国人士渐渐明白到中国必须改革以求存。他们发动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自强运动”，引用当时著名学者魏源之言：“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在这种精神影响之下，翻译馆（同文馆）及模仿西方的兵工厂、船厂、军事工业相继建立。这个延续了三十年的运动只是表面地尝试现代化，只要求立刻见效的几个方面，而完全忽视了西方文明的更重要部份，如政治体制、经济结构、哲学、文化和艺术等。很可惜的是即使当时的开明分子，也认为中国只需要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便可生存下去。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国首先尝试适应新世界体系的自强运动便断然终止。一些开明学者和官员们，明白了以前改革的范围太狭而想作新的调整。他们决定把政治改革列入现代化的计划中。康有为和梁启超鼓吹仿效彼得大帝和明治天皇的改制。虽然，为时已晚，改革者仍未鼓吹全盘西化，而只是推动一个中西合璧的体系。这个运动的精神正如官

像学者张之洞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是，康有为的改制在1898年推行了一百天后就被保守分子摧毁。

同时，孙中山发动了革命活动，他认为只有全面革命（而不是局部的改良），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他获得秘密团体、下层社会及海外华侨的支持。一般学者及乡绅则跟随康、梁路线。不过百日维新失败后，知识分子愈来愈多追随孙中山。原来被看作叛徒的他，一变而成为爱国的革命家。辛亥革命成功及翌年成立西方体制的共和国结束了三千年来的帝皇制度，中国乃以全新的共和国形态出现。

中国虽然已打倒了旧的政体，但旧社会的习惯和作风却继续存在。中华民国成立后并未带来预期的和平和秩序，因此，知识分子觉悟到没有一个彻底的思想改变，不能期望有良好的政府或进步的社会。留学日本及欧美的知识分子，如陈独秀、蔡元培和胡适等回国后在1910年代的后半期，推动了新文化运动和思想革命，形成1919年的五四运动。当时的精神是反对旧传统，打倒孔家店，推崇“科学”和“民主”。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看到两条主要路线在这个冲激过程中出现：其一是杜威的实用主义，由他的学生胡适倡导，是社会慢慢改革的路线；另一是马克思激进革命路线，在俄国大革命冲激下由陈独秀及李大钊两位北京大学教授推动。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寻求适应现代世界的第三次尝试。

1920年代以后的一段中国历史，主要的是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斗争。国民党建基于孙中山早期的革命组织而于1913年正式成立，共产党则在“五四”之后，于1921年创立。共产党成长得很快，并且和工人及农民有密切联系，但却是一个幼年的团体。共产国际（Comintern）试图利用国民党的基础去发展共产党的影响，并劝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另一方面，孙中山极欣赏俄国革命的成就，希望得到苏联援助以重整他的党和军队。西方国家的支持军阀及在1919年巴黎和会的背弃中国利益，更加强了孙中山以上的意念。此外，孙中山相信所有的中国人，不分党派都有资格参与他的扫除军阀及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1923年国共合作，但共产党员并未放弃党籍，共产党本身亦未解体。

第一次国共合作只有四、五年。孙中山在世期间，国共合作尚可维持，到1925年孙氏逝世后，国共关系便愈来愈紧张。1927年国民党军事领袖蒋介石反共清党，次年成立南京政府，国共乃正式分裂。

1927年分裂之后，中国共产党员便匿居上海活动；另一方面，毛泽东及其同志在湖南江西边区活

动，解放了充满潜力的当地农民。毛泽东的成功与上海共产党的失败是一个鲜明的对比——在上海，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一方面不断地受到国民党政府的攻击，另一方面他们数次武装起义都告失败，毛泽东于是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唯一希望。但毛氏仍未能进入中央政治局，只能在共产党中央组织以外活动。

毛泽东一方面不为共产党中央所接纳，另一方面又受国民党的攻击。1930年到1934年间，蒋介石在其德国军事顾问协助下，发动了五次围剿。于是1934年10月中国共产党开展有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移居中国西北。长征途中，1935年1月在遵义，毛泽东获得足够的支持，改组了党中央领导层，成为中国共产党运动的领袖。毛泽东反败为胜，但莫斯科一直到1938年才承认他的领导地位。

1937年日本再度侵略中国。国共面对共同敌人，乃再组联合阵线。1945年中日战争结束后不久，内战又告开始。经过八年抗日战争，通货膨胀威胁日深，加上人民厌战的种种问题，国民政府虽然在军事装备方面较为优越，并且得到美国支持，但终于在1949年失去大陆，偏处台湾。从1921年开始，经过二十八年的斗争，中国共产党终于取得统治权力，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造成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新的国格。

从历史观点上看，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学者和领袖们在采纳西方的民主或共产思想时，都尽量同化、融合，希冀减少外国色彩。魏源想以西方技术抗拒西方。孙中山虽推行共和政制，但却主张使用五权宪法，而不采用西方三权分立。毛泽东接纳马列主义，却更加努力建立他自己的“新民主主义”及“毛泽东思想”。邓小平亦要一个中国式的四化。这些中国学者和领袖们始终在寻找一个途径——要中国彻底现代化，但又要保留相当的中国精神。现代化不是无条件地接纳西方文化，而是创造一个中国形式的现代化新文化，并且在潜意识中，中国式的现代化更有超越西方的形态。

在过去一个世纪的冲激及寻求生存的路途中，中华人民共和国达到其他阶段各领袖所不能达到的成就。新中国有民族自尊、自信、自力更生及强烈的民族光荣自豪感。国内方面，中国现在进行四个现代化，希望在公元2000年成为先进国家，走向“大同”的理想。国际方面，中国已成为世界政治舞台中的前进主力，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声望甚高。各国领袖都盼望到北京来访问，认为到中国是一种无上的荣誉。我对中国的未来非常乐观，并对它的过去感到光荣和自豪。